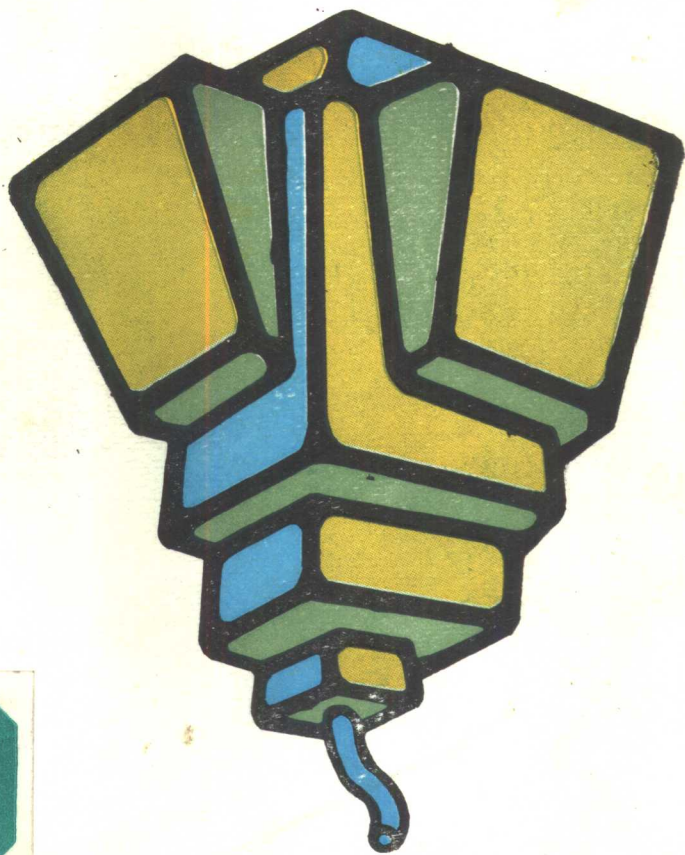


农村亮出了黄牌

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唐忠新



农村亮出了黄牌

988090

唐忠新

中国妇女出版社

农村亮出了黄牌
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作 者：唐忠新
责任编辑：周 俭
封面设计：李东安 张鹤龄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
发 行：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
印 刷：辽宁朝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印 张：5.75
字 数：114千字
版 次：1989年3月辽宁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ISBN 7-80016-129-3/G·67 定价：2.03元

顾问：雷洁琼 陆学艺 王 辉

主编：潘允康

前 言

《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我们奉献给共和国四十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1989年，对于我们共和国和她的全体公民来说，是重要的、令人难忘的和极富纪念意义的一年。共和国的大厦经过40年艰苦卓绝的建设，如今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开始于10年前的那场改革开放的伟大进军，已使祖国母亲褪去了因动乱和衰败而显露出的憔悴和愁容，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容颜。在此值得庆贺的时刻，每一个祖国忠诚的儿女，都理所当然地向母亲捧上一片炽热的赤子之情。作为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奉献什么呢？献上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热情洋溢的美妙文章？这些本是诗人、歌唱家和文学家们的专长。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敬献于祖国和人民的面前。

古人说，人到四十而不惑。我们的国家在步入第四十个年轮的时候，同样需要更加冷静和清醒。回首往昔，岁月峥嵘，值得国人自豪和赞美的宏图伟业实在太多了。我们无疑

需要以40年建设和10年改革的辉煌成就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但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成败攸关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是大步迈进后的整顿、新的腾飞前的调整。在新旧体制的转换当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的心理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此，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讳疾忌医。相反，越是在形势喜人、成就斐然之际，就越需要居安思危，反躬自省，其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误，更快地开拓前进。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伟大的理论，现在是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上总结建国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年来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正是基于这一宗旨，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样一套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时宜的丛书。不过我们相信，只要读者认真读下去，恐怕不难体味到浸润于字里行间的那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和对祖国人民的深沉挚爱。爱之深，必然责之切。社会学既然以发现和研究社会问题为其重要职责，那么，我们这些与共和国相伴而生、血脉所系的社会学者，要表达自己对祖国的一片真情，最佳方式莫过于帮助社会准确地诊出隐藏于肌体中的种种疾患，迅速发出预警信号，以期引起国人的警觉，进而采取措施及时疗救了——这便是我们的初衷和企盼。

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经济过热、秩序混乱？还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当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经济领域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责任提醒人们：中国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广泛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经济问题常常和社会问题相互渗透，互相牵连，产生了经济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问题中的经济问题，情况就更为错综复杂了。因此，应当引导人们把视野从经济领域扩展开来，转向从经济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把经济和社会溶为一体。这套丛书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和研究了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首批出版的这十多部书中，就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新闻舆论监督、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消费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村和都市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犯罪问题、婚姻家庭问题等方面，可见涉猎的范围是很广的。然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一中心议题密切相联的。

担任丛书各分册写作任务的作者，大多是从从事社会学专业研究和教学，或对社会学有浓厚兴趣、并在有关领域有所建树的中青年人。他们依据翔实的调查资料，以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论证，以理服人，敢于立异标新，放创一家之言，就各自专擅的论题坦率地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有的作者不仅着重分析了问题的特征、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而且提出了一些决策咨询和参考意见。本着尊重作者本意及其独立见解的前题，在丛书的统编中，对各分册作了一定的调整和修改。我们的目的，是希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多维透视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发表我们的一孔之见，从而鸣响震聋发聩的警钟，进一番虽然逆耳但却有益于社会健康的诤谏之言。

我们愿把这并不优美的警世钟声，汇入欢庆祖国诞辰四十周年的雄伟乐章，我们希望这组不太和谐的颤音和变奏，

能够给激越昂扬、充满欢乐和喜悦情调的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增添几分深沉、几分雄浑、几分冷峻——这难道不正是当今社会所同样需要的吗？

编 者

1988年12月



目 录

序 言	1
一、贫富分化的负效应	8
1. 贫富分化的产生	8
2. 个体之间贫富分化的负效应	18
3. 区域之间贫富分化的负效应	28
4. 国情·政策·负效应的强弱	34
二、农业生产步履艰难	39
1. 不该发生的跌落	39
2. 难以承受的压力	44
3. 自身固有的弱点	53
4. 再度腾飞的对策初探	61
三、陋俗迷信泛滥	72
1. 神州原野的愚规陋俗	72
2. 中国农民的鬼神迷信	79
3. 陋俗迷信的悲歌惨剧	82



4. 陋俗迷信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	87
5. 陋俗迷信与当代华夏文化氛围·····	91
6. 陋俗迷信与区域社会发育水平·····	94
7. 寄希望于工业文明·····	97
四、教育危机后患无穷·····	101
1. 危机的含义及其表现·····	103
2. 危机的后果·····	111
3. 危机的根源·····	119
4. 出路何在·····	129
五、组织系统的瘫痪与扭曲·····	137
1. 超强控制的反面：滞后性瘫痪·····	137
2. 扭曲的表现：“太子”接班、“职能转换”、 性质蜕变·····	143
3. 瘫痪扭曲的后果：农业再生产受挫·····	148
4. 控制弱化的代价：社区秩序紊乱·····	153



5. 替代组织的复旧：宗族势力抬头·····	157
6. 农村组织的再造：现状与设想·····	161
结束语·····	167

序 言

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都市里的中国人，面对着广袤的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面对着“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的社会现实，面对着温州、佛山、苏南腰缠万贯的庄稼汉，终于信服了改革的威力。“改革”，这个最初发生在都市之外，又最初表现为“包产到户”的巨大浪潮，把数以万计的华夏农民推上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舞台。

1976年10月的胜利意味着动乱岁月的结束，历史发展到了大变革的前夜。当吃着白馍的城里人还未从一系列的政治突变中冷静下来的时候，那些食不裹腹的农民在远离都市的古老土地上，以极其原始的方式揭开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序幕。

据说，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春天，在明朝皇帝的故乡，一群面黄肌瘦的庄稼汉再也无法忍受集体化造成的饥饿的煎熬，迫于干旱的威胁，大着胆子在“不动碾子”作物上有限度地搞起了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并不是近年的新创举，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

年代的合作化后期。1956年下半年，高级社成立不久，浙江省温州地区和广东省佛山地区的部分农业社曾经实行过包产到户，只是不到一年就被指责为资本主义主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同样没有逃脱受批判的厄运。或许由于安徽包产到户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地区，领导机关和宣传机器对它的批判也更加卖力。自此开始，对包产到户的错误指责从未间断过，以致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少数农民重新实行包产到户时，马上遭到了一系列攻击。什么“倒退”、“复辟”、“单干风”等陈词滥调一古脑地倾泻过来，大有将其扼死之势。然而，动乱岁月结后束的中国，毕竟不同于“文革”时期。受够了集体化之苦和尝试过包产到户之甜的安徽农民，基于自己特有的经验，无视一切不合理的指责，一步步扩大包产到户的规模。1978年，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1200个；1979年达到了38000个，占生产队总数的10%；1980年猛增到70%以上，并且取得了惊人的增产效果。与此同时，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区公开的或秘密的包产到户也在发展之中，1980年秋，全国农村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占20%，这也就是说，大约有两亿农民进入了家庭经营。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在落后地区存在的必要性，终于使其合法地站稳了脚跟。

“此后两年，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多样化发展和大规模变动的时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这个阶段多种责任制形式并存的写照。有并存就有比较。在优胜劣败法则的作用下，那些以为允许部分地区双包到户已经达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极限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双包到户的

实践并没有却步不前，它越过种种严格限定的条条框框，不可阻挡地向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蔓延开去”^①，向牧区、林区、渔区、菜区，大城市郊区和机械化作业区迅速扩展。1983年，全国农村95%以上的社队实行了双包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庄严地写进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如今，几乎没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但对家庭农业经营方式的内在根据说法不一。有些人习惯于用生产力水平低来解释农业经营家庭化的合理性，并不符合实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和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生产力水平是相当高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甚至超过了某些工业部门，但是，这些国家的家庭农场还相当普遍。1975年，日本有农场及农业企业496.5万个，其中495.3万个是家庭农场。荷兰约有5万个养猪场，多为家庭式经营。加拿大的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0%多，美国亦如此。其实，农业经营家庭化的真正原因是农业的要求与家庭特点的内在统一。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动植物有机体，它的生产过程大都固定和散布在很大的地面上，不能高度密集。这种分散性的特征要求经营组织的规模不宜过大，大规模的经营组织形式未必能够带来高效率的经济效益。农业生产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产品上，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项作业都不易实行标准化、规格化，劳动考核和报酬的计量难以做到科学、准确，而农活的

①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安排又随机性极强。这既要求经营组织的每个成员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不斤斤计较，又要求他们具有高度随机的积极、负责和主动精神。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相应地要求经营组织形式比较稳定，否则会严重影响再生产的进行。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强烈要求经营组织的各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共同承担、克服各种风险的协作意愿。这些要求，即使单独来看也相当苛刻，而适宜的农业经营组织又应该同时予以满足。历史证明，有些组织能够适应农业生产的一些特点，却不能适应另一些特点。唯有家庭是个例外。

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具有多重功能的经营共同生活的群体，含有经济、伦理、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家庭成员之间无需单纯依靠经济利益就能保持强烈的协作意愿和主动、负责精神，从而能够适应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考核和报酬的计量难以精确，农业劳动随机性强的要求。家庭是最稳定的社会组织，人们的血缘联系无法选择，姻缘联系可以选择，但也不能轻易的离异；再加上家庭内部亲子关系中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多方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故能够适应农业经营组织应该稳定的要求。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深厚的感情，家庭群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从而易于克服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给再生产带来的危机。家庭组织规模较小，成员在性别和年龄方面具有非单一性和多层次性的特征，也比较适合农业这种综合性、分散性的生产经营。

所以，一旦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正确方式，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了组织结构方面的最可靠的支点。事实也的确如此。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农村经济在改革浪潮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979—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7.5%，平均每年递增9%；粮食产量增长了33.6%，平均每年递增4.9%；棉花产量增长了180.4%，平均每年递增18.8%；油料产量增长127.1%，平均每年递增14.7%。这种在较高水平基础上的持续超高速增长，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

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村劳动力的“松绑”，促进了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了3484亿元，比1978年增长6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7.7%，占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1.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6.9%，从业人员755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9.8%，成了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伴随着农村非农产业和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中国农村的自给半自给性经济开始向大规模的商品性经济转变。1986年，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达到了58%，比1978年增长13%。农村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达到了68.1%，比1978年增长14.4%。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达到了199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倍多。特别是8亿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大大增强，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自然经济跨入了商品生产者的行列，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生产的大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优化了收入结构。1986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为423.76元，比1978年增长了2.17倍，平均增长速度为15%左右。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26.8%上升到了1986年的81.5%，意味着中国重新

恢复农户经营占主导地位的第一步改革已经完成；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80%以上，意味着我国农民的收入质量有显著提高。

收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消费生活的改善，1978—1986年，平均每个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由116.06元增加到了356.95元。其中细粮消费的比重从49.6%上升到了81.9%，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加到了15.3平方米。改革10年，基本上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许多地区正在向小康型生活方式过渡。

所有这一切都冲破了中国城乡隔离的传统格局，大批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众多村庄发展成了兼具城乡特点的新型社区，原有的小城镇充满了生机。全国城镇数目从1978年的2千多个增加到了现在的1万余个，市镇人口的比重由17.9%上升到了现在的30%多。由此标志着我国农村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全面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10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中国农村在改革10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说明，改革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改革是繁荣农村生活的可靠保证。唯有改革才能消除中国农村的贫穷状况，唯有改革才能促使8亿农民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然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步改革，不可能完全解决自然农业甩给我们的所有难题，亦不可能完全避免政治、文化改革的滞后性引发的一系列新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在第一步改革取得上述巨大成绩的同时，某些新矛盾正在滋生，某些老问题也在蔓延。其中有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或已进行了较多的探讨。笔者试图论述那些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尚未引起